



晚清时期 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d Cross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池子华 著

海外借

 科学出版社



晚清时期 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d Cross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池子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中国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扶危济困为宗旨,在战争救护、灾荒救济、社会援助诸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耀眼的角色。本书全面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在晚清时期“博爱人群”的风采,特别是通过对红十字会从事的战地救护、灾害救济、难民救助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揭示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中国人道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本书适合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及中国近代社会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 / 池子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03-060980-9

I. ①晚… II. ①池… III. ①红十字会-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3977 号

责任编辑:耿 雪 李秉乾 / 责任校对:王晓茜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字数:296 000

定价: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绪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研究路径和基本框架	7
第一章 红十字运动的启蒙	11
第一节 红十字运动溯源	11
第二节 启蒙：大众传媒的推动	14
第三节 孙中山与孙淦——启蒙运动的先驱	19
第四节 外国人的“示范”	28
第二章 最初的尝试：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	32
第一节 中国救济善会的创建	32
一、陆树藩——中国救济善会的缔造者	32
二、“庚子之变”与中国救济善会的创建	34
三、“旧瓶新酒”：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	36
第二节 中国救济善会的人道行动	39
一、“爱仁”济渡：陆树藩北上	39
二、救援行动的展开	41
三、顺直春赈与善后之举	44
第三节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	48
一、济众博施 功勋卓著	48
二、成功背后的无奈与辛酸	50
第四节 从实践到理念：陆树藩的“红十字梦”	54
一、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动因	54
二、红十字会——陆树藩的“设想”	57
第三章 “发轫于俄日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	61
第一节 日俄战争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之设	61

一、日俄战争爆发前后国人的红十字诉求	61
二、沈敦和“接力”陆树藩	64
三、不容“淡忘”的施则敬	67
四、前事后师：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69
第二节 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	72
一、李提摩太斡旋“助力”	72
二、上海万国红会成立标志中国红会的诞生	75
三、中国红十字会何以首先诞生于上海	78
第三节 从“幕后”到“前台”：清政府的角色转换	80
第四章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日俄战灾救援	85
第一节 日俄战灾救援准备与动员	85
一、救援规则的制定	85
二、众擎易举——救援物资的动员	88
第二节 分会之设与救援行动的推展	92
一、复制“营口模式”广设分会	92
二、援救难民“出险”	98
第三节 日俄兵灾的赈济	103
一、兵灾赈济概况	103
二、赈济灾民实录	106
第五章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终结与中国红十字会“自立”	108
第一节 结万国红十字会之会局	108
一、功德圆满：万国红十字会的终结	108
二、红十字勋章光彩照人	111
第二节 走上“自立”之路	113
一、自主自立：官方的期待	113
二、来自民间的挑战：王熙普理想和廖太夫人实践	116
三、“自立”的选择	120
第三节 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	124
一、关于首任会长的考辨	124
二、创办医院及学堂：巩固“初基”举措	132

三、关于《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	136
第四节 中国红十字会的“大清”蜕变	141
一、盛宣怀：解不开的“大清”情结	141
二、红十字会：从“中国”到“大清”	143
三、“易名”的多维效应	146
第六章 “大彰于武汉之师”——辛亥战时的救护行动	150
第一节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红十字会动向	150
一、沈敦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	150
二、盛宣怀会长被罢免	153
三、吕海寰继任与中国红十字会“回归”	156
四、“京会”与“沪会”之间的博弈	158
第二节 战地救护概况	163
一、救援保障系统的构建	163
二、武汉战场的救护	168
三、南京战场的救护	174
四、其他战场的救护	176
第三节 留日医学生及“京会”的救援行动	180
一、留日医学生的救护行动	180
二、“京会”的救援行动	183
第四节 辛亥救护行动的意义	186
一、赢得广泛认可	186
二、为走上国际舞台铺平道路	188
三、为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90
第七章 中国赤十字会的辛亥救援	192
第一节 张竹君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	192
一、“女界梁启超”张竹君	192
二、立足上海拓展发展空间	199
三、创建中国赤十字会	210
第二节 张竹君与沈敦和：“口水战”真相	215
一、张竹君“炮轰”与沈敦和反击	215

二、廓清历史的迷雾·····	218
第三节 中国赤十字会的战事救护·····	222
第四节 成功：来自社会各界的大力相助·····	226
第八章 清王朝覆灭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转型·····	229
第一节 “立案”完成身份上的转变·····	229
一、“立案”之请·····	229
二、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准予“立案”·····	230
第二节 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232
一、代表“资格”之争·····	232
二、首次“亮相”影响深远·····	234
第三节 首届会员大会的召开·····	236
一、首届会员大会召开的背景·····	236
二、大会议程·····	238
三、“京沪合并”与新运行机制的确立·····	240
第四节 统一大会的期许·····	242
一、统一大会“统一”什么·····	242
二、统一大会的盛况·····	245
三、“实奠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	248
结论·····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56
一、报刊·····	256
二、著作及资料汇编·····	257
三、论文·····	260
后记·····	263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笔者研究红十字运动几及二十年，早期合著《百年红十字》一书，系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历程的学术著作，开辟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领域。虽然该书有60万字之巨，但因内容涵盖时间跨度大及“厚今薄古”的编史原则，涉及晚清时期红十字运动的内容如蜻蜓点水，许多问题无法展开。

2004年，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探赜索隐，完成并出版了40万言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这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学术论著。不过，由于资料所限，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内容依然显得很薄弱，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2005年，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成立，笔者出任中心负责人。多年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江苏省红十字会、苏州市红十字会、苏州大学、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等单位及学界、业界同人的支持下，研究中心把资料建设纳入长期的“战略规划”，为红十字运动的深入研究创造条件。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长远规划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先后出版了《〈苏州红十字会志〉资料长编》（上下册）、《〈申报〉上的红十字》（4卷）、《〈大公报〉上的红十字》、《〈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3卷）、《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已出版1~9辑），这些资料约上千万字。目前这项计划仍在推进之中。经过10多年的积累，规模初具，加之《大清万国红十字会档案》等档案资料的公布，深入研究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3月10日，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在新中国得到了巨大进步和蓬勃发展，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历史团体。一百多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赞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晚清时期是中国红十字会孕育、萌芽、产生、初步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绝对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因此，该项研究对于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以及对深化晚清史、社会史研究都大

有裨益,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当代发展,亦不无借鉴价值。正因为如此,笔者从2014年开始,尝试写一部《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专著,并于2016年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承蒙学界厚爱,此项研究幸运立项,并得以顺利推进。

二、学术史回顾

2009年,笔者与杨红星博士合作,发表《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一文^①,对之前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其中自然包括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研究成果。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这里仅就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及近年取得的新成果做一概述。

这里应特别感谢周秋光教授、朱浒教授对红十字运动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周秋光教授是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长期研究中国慈善问题,出版过《中国慈善简史》《近代中国慈善论稿》等著作。目前主持《中国慈善通史》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研究慈善过程中,周秋光教授对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有所研究,参与了台湾张玉法院士主编的《……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的写作,该书由台湾红十字组织2004年编印,其中第一章“晚清时期”即由周秋光教授撰写,内容涉及组织的演变、会内行政、救护与赈济、国际交往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周秋光教授完成《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一书,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分上篇“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1904~1911)”,下篇“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1912~1927)”,共25万言。该书发掘各种文献资料,论述了晚清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会内的行政、红十字会在这段时间的战争救护与赈济活动及国际交往等内容。对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其基本结论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國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内因与外因互动的结果,而内因尤为重要。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人们受传统慈善思想和观念的熏陶,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红十字会的好处,于是就主动地去了解它、研究它,并在外国人的帮助下创立了相关的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据此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之成立,

^① 杨红星、池子华:《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实为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

其二，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得力于清朝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二是得力于一批热心慈善事业、有见识且能因时变革和创新的中外善士投身其中；三是得力于中国红十字会内部所奉行的一套完整、合理的不同于传统慈善事业且远比其更为进步的近代化慈善管理及其运作机制（最初实行董事会制，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之后便按照国际通用做法，由全体会员无记名票选常议员组成常议会，实行议会制），这一点尤为重要。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以其自身的创制，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其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以其所从事的各种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充当了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各有关慈善团体发挥了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不分中外、种族与国家，用善心呼唤个人与民间团体捐款捐物、相帮互助、扶贫济困、救伤葬亡，对于缓解当时条件下的民生困苦与消弭社会乱象，使社会从动乱、危机和崩溃之中回复过来，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社会动力，一种调节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

其四，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慈善组织。晚清时期中国既然加入了这个国际性组织作为会员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展各种国际性的交往及参与一些国际性的事务。尽管当时的清政府主观上对外始终采取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但实际上早已事与愿违。当时的一批驻外使臣不时地要把有关红十字会的国际性问题提交给清政府决断，而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围绕红十字会的国际性问题发表意见和采取对策，并不得不派人出席相关的国际性会议。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在促使清朝政府从封闭走向国际，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

周秋光教授的研究颇有见地，对本书的深入探索多有启发。

朱浒教授在其《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的专著^②，以及《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

① 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页。

②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的论文中^①，都对中国红十字会路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以往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实践脉络进行认真分析，从而掩盖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的真正途径”“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与中国慈善传统相结合，主要是通过当时重要的救荒机制即义赈来实现的，而不仅仅是依靠相关知识的传播”^②。“事实上，尽管红十字会的形式完全是西方舶来品，但是它也受到中国内部情境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地方性社会资源才得以在中国立足的。”^③在他看来，“红十字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慈善文化的相通性，而是有一条相当具体的依赖路径，即与标志着中国救荒事业重大发展的晚清义赈所提供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联系”。他强调，地方性实践即义赈的作用，认为正是“义赈这种跨地域的地方性实践机制在上海的持续运转，才使得上海绅商能够屡屡在实际行动中将红十字形式运用于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起源过程中的所有实践都属于这种跨地域的地方性实践机制的范围”^④。朱浒教授的探索，视野开阔，拓展了本书研究的思路。

除此之外，近年来涉及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夏现伟和孙善根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第一人沈敦和述评》^⑤、邱广军的《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士的难民救助活动》^⑥、冯志阳的《庚子救援研究》^⑦、邓文池的《〈申报〉对晚清红十字会的舆论功效研究》^⑧、李佳霖的《红十字会在近代东北地区的建立及活动研究》^⑨、池子华的《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⑩、池子华和崔龙健的《“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⑪、池子华和

① 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68页。

③ 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页。

④ 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4页。

⑤ 夏现伟、孙善根：《中国红十字运动第一人沈敦和述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⑥ 邱广军：《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士的难民救助活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⑦ 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⑧ 邓文池：《〈申报〉对晚清红十字会的舆论功效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⑨ 李佳霖：《红十字会在近代东北地区的建立及活动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⑩ 池子华：《红十字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光明日报》2013年9月5日。

⑪ 池子华、崔龙健：《“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樊翠花的《中国红十字会何以首先诞生于上海》^①、傅亮和刘玉斌的《清末民初红十字会的本土化》^②，等等。这些成果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对本书的研究多有启发。美国学者李嘉伦（Caroline Beth Reeves）的博士论文 *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1900~1937* [《慈悲的力量：中国红十字会（1900~1937）》]^③，梳理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和早期发展，考察了这一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论述了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过程中地方精英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模式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颇有参考价值。

应该说，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中争论性的问题并不是很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

一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时间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争议，1904年3月10日，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五国友人联手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同时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这是红十字会系统和学界基本一致的看法。但中国台湾学者张建保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1912年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30日，为了结合国内各种红十字团体，乃于上海汇中旅馆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从此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正式成立”^④。他指出，“根据种种迹象，民国元年（1912年）才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关键”，理由有三：一是政府立案。“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据副总统黎元洪的建议，乃命令内务部准予中国红十字会立案，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获得政府正式立案，从此成为正式合法的社团。”二是国际承认。“清末中国红十字会虽然加入了《日内瓦公约》，但最初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仅为临时组织……民国元年上海总办事处负责人沈敦和与日本赤十字社取得联系，由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入会，获得该委员会的同意。同年万国红十字大会第9次会议于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首次获邀与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参与的国际会议，代表了该会从此

① 池子华、樊翠花：《中国红十字会何以首先诞生于上海》，《历史教学》2016年第5期。

② 傅亮、刘玉斌：《清末民初红十字会的本土化》，《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1900~1937*,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④ 张建保：《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页。在其《近代中国红十字会成立问题考辨——以盛宣怀文件为中心》（《“国史馆”馆刊》第35期，2013年3月“国史馆”编印）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三是制度确立。“中国红十字会各项制度如组织、会员、分会等都是在民国元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确定下来。”^①张建球先生的观点固然新颖，但却难以使人信服^②，视为一家之言可也。

二是首任会长问题。

长期以来，红十字系统认定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传统观点受到质疑。2002年笔者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吗？》一文^③，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首任会长并非吕海寰，而是盛宣怀。在随后出版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④，笔者对此问题又做了进一步探讨。不料原本的学术问题却引起轩然大波，相关争论不休，乃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2005~2008年，分别与国家图书馆社会科学咨询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的求证，形成了三个研究报告，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考辨》（李凡先生主持）、《中国红十字会的第一任会长及相关问题考辨》（朱浒先生主持）、《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研究》（冯金牛先生主持）^⑤，得出一致结论，即盛宣怀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2010年6月8日《中国红十字报》头版头条发表《盛宣怀：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报道^⑥，这场风波才算尘埃落定。

盛宣怀是官方任命的第一任会长，已成学界共识，至于他是否出任上海方面“公推”的会长，还存在分歧，不妨求同存异。

除此之外，朱从兵教授专门回答了《为什么盛宣怀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认为盛宣怀是一个在当时的官场上以“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而著称的人物，他的这种能力是吕海寰不可比拟的，且自1906年以后，吕海寰已返京赴兵部尚书等任。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考虑由盛宣怀担任会长是合适的。而且，自1896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后，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的盛宣怀长期驻在上海，对上海中外官商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参与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筹办过程，他对中

① 张建球：《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42页。

②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说质疑》，《光明日报》2007年9月21日。

③ 池子华：《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吗？》，《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④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 三篇研究报告，汇编录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探本溯源——来自博爱论坛的声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⑥ 《盛宣怀：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中国红十字报》2010年6月8日。

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活动也相对热衷，自称“素性喜办赈济”，进行过独立思考。由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可谓正当其选。^①

三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竹君与沈敦和“龙虎斗”问题。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红十字会发生了一次“舆论风波”，那次舆论风波是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引起的，矛头直指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灵魂人物的沈敦和。对此，有学者发表文章，引发“揭秘”红十字会“辛亥诚信危机”，谓“中国红十字会的破事儿，从辛亥革命就不干净”“中国红十字会龙虎斗：慈善机构早就不‘干净’了”“美女1911年发难：质疑中国红十字会诚信”“民国‘郭美美’事件”等话题云云。^②显然这是借社会热点为博取眼球而做出的非理性“研究”，有“抹黑”红十字会之嫌。对此，笔者就此问题进行考察，认为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张竹君“炮轰”中国红十字会实际主持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发起人沈敦和，并没有引发所谓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将张竹君比喻为“民国时期的‘郭美美’”，更是无稽之谈。张竹君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与沈敦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一样，都是为了救死扶伤，遂行人道主义。所谓“张竹君的所有行为，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倒因为果，与史实不符。把1911年“舆论风波”演绎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谓红十字会“不干净”“不诚信”，是对历史的误读。^③

总体而言，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为本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红十字运动研究一是不够系统、全面；二是一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三是一些带有争议性的问题有待探索。所有这些，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三、研究路径和基本框架

本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并借鉴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同时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厘清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红十字事业诸方面的拓展，

① 朱从兵：《为什么盛宣怀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见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6~97页。

② 雪珥：《1911：褪色的红十字——民国“郭美美”事件》，《包头晚报》2011年9月29日；雪珥：《1911：褪色的红十字》，《中国经营报》2011年9月3日。

③ 池子华：《还原历史真相：1911年红十字会“舆论风波”——张竹君与沈敦和上海“龙虎斗”探源》，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8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8~199页。

把“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结合起来，立体展现红十字会与晚清社会的互动关系。同时，聚焦考察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对红十字会组织的运作方式、运行机制，以及官方与民间、红十字会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进行透视，把整体性宏观研究与区域性微观研究有机结合，力争做到有广度、有深度、有力度地再现红十字运动的波澜壮阔场面和人道主义魅力。基于此，笔者将所建构的基本框架和研究理路提炼归纳如下。

第一章，红十字运动的启蒙。19世纪70年代，红十字在“西学东渐”大潮中登陆中国后，成为推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重要力量。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被誉为近代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本章从红十字文化“本土化”入手，梳理大众传媒推动下红十字文化在一定范围尤其在东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实态。在红十字启蒙运动中，来自民间的力量不容忽视，其中有两位先驱——孙中山和孙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孙中山英文功底颇深，但作为革命家的他，一生中只有唯一的一部译作，即《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他因此成为第一位系统引进红十字救护知识的中国人。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的这一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它的启蒙意义也不容忽视。孙淦为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号呼奔走，艰苦备尝”。作为“请准回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孙淦的“创兴”之梦尽管没有实现，但其振聋发聩的启蒙，为红十字会的创立铺平了道路。有识之士为红十字走进中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启蒙”宣传，使国人对红十字会由陌生逐渐熟悉，加之“西人”及日本赤十字社（初名“博爱社”）的“示范”，更使国人领略到红十字的魅力，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紧迫性激起共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陆树藩走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移花接木”的实践。

第二章，最初的尝试：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陆树藩开启国人创办红十字会的最初尝试，他所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虽然没有使中国救济善会走得更远，但陆树藩“移花接木”的实践和对未来的“设想”，却使人们看到了“红十字”的熠熠生辉，预示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指日可待。

第三章，“发轫于俄日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1904年日俄战争的血雨腥风，最终使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横空出世。上海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发源地。中国红十字会何以首先在上海诞生，主要基于上海是近代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城市，得风气之先；旅居上海的慈善家“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上海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为

兴办红十字事业奠定物质基础；肥沃的慈善文化“土壤”，浓郁的公益氛围，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这些因素交叉互动的合力，最终使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

第四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日俄战灾救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为救助日俄战争中的难民，红十字会做了较为充分的救援准备与人道资源的动员；在东北创设分会，救护难民出险；“大兵之后”广泛开展赈济，直至1907年。

第五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终结与中国红十字会“自立”。1907年日俄战争救援结束后，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完成救护使命而“终结”，中国红十字会蜕变而出，走上“自立”之路。为“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红十字会同设医院，培养医学人才，参与社会救助活动，中国红十字事业得到初步发展。1910年盛宣怀被朝廷任命为会长后不久，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红十字会”，给这一民间社团抹上浓重的“官办”色彩，由此造成“沪会”与“京会”的对峙。

第六章，“大彰于武汉之师”——辛亥战时的救护行动。大清红十字会开办不久，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为适应战时救护需要，沈敦和抛开大清红十字会，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负责实施战地救护事宜。与此同时，清政府任命吕海寰继任会长，把“大清红十字会”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无论“沪会”，抑或“京会”，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战地救护行动。尤其是“沪会”，遍设分会，成效显著，令举世瞩目，“大彰于武汉之师”。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瘥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中国红十字运动亦因此走出低迷状态。

第七章，中国赤十字会的辛亥救援。辛亥之役，战事惨烈，伤亡累累。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其他慈善团体也身体力行，纷纷加入伤兵救护行列中，特别是巾帼豪杰张竹君发起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俨然与中国红十字会比肩。它虽自树一帜，但却不是“另类”，而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旁系”，在中国红十字会史上当有一席之地。

第八章，清王朝覆灭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转型。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纪元。作为创始于清朝、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的人道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将何去何从，面临新的抉择。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改弦更张，主动求变。一方面，谋求新政当局的支持，达成“立案”成为合法社团；另一方面，对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有所担当，对内建章立制实现规范化运作。通过不懈努力，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华民国肇建之年，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转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